

范鹏 总主编

陇上学人文存

喻博文卷

甘肃人民出版社

陇上学人文存

喻博文 卷

喻博文 著 颜华东 编选

 甘肃人民出版社



0198448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陇上学人文存·喻博文卷/ 范鹏总主编; 喻博文著;
颜华东编选.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226-04333-2

I. ①陇… II. ①范… ②喻… ③颜…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 199398 号

责任编辑: 李依璇

封面设计: 王林强

陇上学人文存·喻博文卷

喻博文 著 颜华东 编选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1/32 印张 11.75 插页 7 字数 294 千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 978-7-226-04333-2 定价: 60.00 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印厂联系)

总序

陇者甘肃，历史悠久，文化醇厚。陇上学人，或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学者，或外来而其学术成就多产于甘肃者。学人是学术活动的主体，就《陇上学人文存》（以下简称《文存》）的选编范围而言，我们这里所说的学术主要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存》精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甘肃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成就卓著的专家学者的代表性著作，每人辑为一卷，或标时代之识，或为学问之精，或开风气之先，或补学科之白，均编者以为足以存当代而传后世之作。《文存》力求以此丛集荟萃的方式，全面立体地展示新中国为甘肃学术文化发展提供的良好环境和陇上学人不负新时代期望而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做出的新贡献，也力求呈现陇上学人所接续的先秦以来颇具地域特色的学根文脉。

陇原乃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人文学脉悠远隆盛，纯朴百姓崇文达理，文化氛围日渐浓厚，学术土壤积久而沃，在科学文化特别是人文学术领域的探索可远溯至伏羲时代，大地湾文化遗存、举世无双的甘肃彩陶、陇东早期周文化对农耕文明的贡献、秦先祖扫六合以统一中国，奠定了甘肃在中国文化史上始源性和奠基性的重要地位；汉唐盛世，甘肃作为中西交通的要道，内承中华主体文化熏陶，外接经中亚而来的异域文明，风云际会，相摩相荡，得天独厚而人才辈出，学术思想繁荣发达，为中华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

近代以来，甘肃相对于逐渐开放的东南沿海而言成为偏远之地，反而少受战乱影响，学术得以继续繁荣。抗日战争期间作为大



后方，接纳了不少内地著名学府和学者，使陇上学术空前活跃。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更是为国家民族的新生而欢欣鼓舞，全力投入到祖国新的学术事业之中，取得了一大批重要的研究成果，涌现出众多知名专家，在历史、文献、文学、民族、考古、美学、宗教等领域的研究均居全国前列，影响广泛而深远。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文社会科学几次对当代学术具有重大影响的争鸣，不仅都有甘肃学者的声音，而且在美学三大学派（客观派、主观派、关系派）、史学“五朵金花”（史学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重点研究的历史分期、土地制度史、农民战争史等五个方面的重点问题）等领域，陇上学人成为十分引人注目的代表性人物。改革开放以来，甘肃学者更是如鱼得水，继承并发扬了关陇学人既注重学理求索又崇尚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形成了甘肃学者新的风范。宋代西北学者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乃中华学人贯通古今、一脉相承的文化使命，其本质正是发源于陇原的《易》之生生不已的刚健精神，《文存》乃此一精神在现代陇上得到了大力弘扬与传承的最佳证明。

《文存》启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在选择入编对象时，我们首先注重了两个代表性：一是代表性的学者，二是代表性的成果，欲以此构成一部个案式的甘肃当代学术史，亦以此传先贤学术命脉，为后进立治学标杆。此议为我甘肃省社会科学院首倡，随之得到政界主要领导、学界精英与社会各界广泛认同与政府大力支持，此宏愿因此而得以付诸实施。

为保证选编的权威性，编委会专门成立了由十几位省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著名学者组成的专家指导委员会，并通过召开专题会议研讨、发放推荐表格和学术机构、个人举荐等多种方式确定入选者。为使读者对作者的学术成就、治学特色和重要贡献有比较准确和全面的了解，在出版社选配业务精良的责任编辑的同时，编委会为每一卷配备了一位学术编辑，负责选编并撰写前言。由于我院已经完成《甘肃省志·社会科学志》（古代至1990年卷，1990至

2000年卷)的编辑出版工作,为《文存》的选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基本依据,加之同行专家对这一时期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研究,使《文存》能够比较充分地反映同期内甘肃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状况。

我们的愿望是坚持十年,《文存》年出十卷,到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达至百卷规模。若经努力此百卷终能完整问世,则从1949至2009年六十年间陇上学人以“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甘肃精神献身学术、追求真理的轨迹和脉络或可大体清晰。如此长卷宏图实为新中国六十年间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全部成果的一个缩影,亦为此期间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业绩的一次全面检阅,堪作后辈学者学习先贤的范本,是陇上学人献给祖国母亲的一份厚礼。此一理想若能实现,百卷巨著蔚为大观,《文存》和它所承载的学术精神必可存于当代,传之后世,陇上学人和学术亦可因此而无愧于我们所处的伟大时代,并有所报于生养我们的淳厚故土。

因我们眼界和学术水平的局限,选编过程中必定会出现未曾意料的问题,我们衷心期望读者能够及时教正,以使《文存》的后续选编工作日臻完善。

是为序。

2009年12月26日

编 选 前 言

喻博文先生 1930 年 10 月生于陕西省富平县一个家境自足的耕读人家,自幼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学养基础扎实,造就勤学慎思的读书习惯和一丝不苟的钻研精神。初高中学习时期,目睹旧政权的腐败,又受革命进步书刊的影响,1948 年在中国两种命运前途搏斗的关键时刻,年方十八岁的他毅然奔赴陕北参加革命,并于同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起初在县区基层从事行政工作。新中国成立后,1956 年考入西北师范学院历史系学习,后因需要被学校党委调出工作。工作之余,夜以继日地研学中国古典名著和有关中国思想史的著作。经历了共和国成立以后二十年多年的风风雨雨,喻先生又做出人生的第二次重要抉择,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科研中去,确定了自己矢志于教书育人的人生道路。先后讲授“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等课程,并自编或合编相关的教材讲义多种。除在母校甘肃师大(即西北师院,现改为西北师范大学)讲课外,还应邀在西北民族学院、甘肃教育学院有关班级学生和省委党校学员讲授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等课程。

喻博文先生先后任教员、讲师、副教授和教授,离休前任中共甘肃省委党校中国哲学教授。

喻博文先生是甘肃省研究中国哲学史的著名学者,在全国同仁中都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据喻博文先生自述,他的治学经历大约有三个阶段,早年专心研



习汉代哲学,这时的代表作是《王符的哲学》一文,发表于《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64年第1期。王符,字节信,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人,东汉时期的哲学家、思想家。他终身不仕,隐居著书,其著作故名《潜夫论》。他肯定“气”是世界万物的来源,一切自然现象“莫不气之所为也”。据此以往研究王符思想者,大多认为王符的哲学思想具有唯物论倾向,或直言就属唯物主义。喻博文先生在这篇论文中,作为本省青年学者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王符哲学思想的内容,明确地揭示了王符思想的二元论特点及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等,与当时中国哲学史研究中认为“王符的唯物主义天道天命观”的说法具有明显的差异,言之有理,持之有故,表达了自己独到的见解。王符是甘肃省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著名思想家,喻先生的研究推动了研究王符哲学思想的进展,对甘肃省乃至全国关于王符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思想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影响,其后甘肃省学者关于王符思想的研究取得不少有价值的成果。在这一时期以至80年代初,喻先生又陆续发表了《西汉初期黄老与儒法的斗争》(《史学月刊》1965年第6期)、《王符与忧患意识》(《甘肃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过去、现在、未来及其他——谈王夫之的治学精神》(《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哲学史定义浅议》(《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哲学史的批判继承纵横观》(《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两则史料辩证》(《学术月刊》1981年第5期)、《人人有个圆圈在——王阳明小传》(《理论与实践》1982年第5期)等论文。喻博文先生的治学重心置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上,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表达了透彻明确的思路 and 观点,颇具学术研究的深度和价值,为其后关于宋代理学及张载思想和防部易学的深入研究,做了充分的学理准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日后他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可以说水到渠成。

喻先生治学道路的第二阶段,诚如他自己所言,“中年研习宋代

理学”。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在长达两千年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对于陶冶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儒学经历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两汉经学空前兴盛之后,再经沉浮起落,至北宋时期,因时代发展的必然和需求儒学又实现了复兴,理学成为儒学发展新阶段的成果,其中作为宋代理学创始人之一的张载的贡献尤其功不可没。

张载(1020—1077),字子厚。原籍大梁(今河南开封),生于长安(今陕西西安),随父侨寓于凤翔郿县横渠镇(今陕西眉县横渠镇)。宋嘉祐二年(1057)张载举进士,经过十余年的仕途生涯后辞官,回到横渠镇讲学、著述,时称横渠先生,弟子多为关中人,后人称他的学派为“关学”。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称张载与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为“北宋五子”,“濂洛关闽”是宋代理学的四大学派。张载博览群书,刻苦地钻研了儒、道、佛的学说,经过深思熟虑,否定和批驳了道、佛的基本观点,而崇奉儒家思想:“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其中《易传》对他影响最大,在他去世的前一年(1076)完成了他的主要著作《正蒙》一书。《蒙》是《周易》的一个卦名,该卦的彖辞中有“蒙以养正”语。蒙,即蒙昧未明;正,即纠正、端正的意思。喻先生对《正蒙》书名的解释令人信服:“教育、启迪蒙昧无知的人,批评、纠正异端邪说,使之归于大中至正之道。”我认为这是对张载《正蒙》书名的最全面准确的诠释。张载著《正蒙》的目的,是以儒家学说批判佛、道思想、建立气一元论的哲学体系,从而开辟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发展的新阶段。张载逝世后,《正蒙》一书由其门人编次、整理刻印流传,关中一带几至“家弦户诵”,影响颇大。

一个学者治学心路的选择,有时与他的故乡之情有着不可割舍的关联。喻博文先生作为出身关中的学者,从小受到“关学”的熏陶似乎是不言而喻的。自宋代以后,明清两代《正蒙》的注疏之作约有十多



种,学界大抵公认以清代王夫之的《张子正蒙注》最为完备精当。但自18世纪末清朝乾隆时期以来,到民国至新中国建立二百多年中,即清王植的《正蒙初义》之后,《正蒙》似已为学界遗忘,20世纪90年代才仅有喻博文先生的《正蒙注译》一书问世。喻博文先生认为,张载是宋明理学的奠基人之一,而宋明理学自宋至清统治了中国思想界长达七八百年之久,《正蒙》是张载的主要著作,全面系统地记录了他的哲学、政治、经济、伦理和文艺等方面的思想。读懂了《正蒙》,就认识了张载。反过来说,要研究张载的思想,必须从此书入手,立足此书。在这里,喻先生明白无误地告诉了我们,他立意注译评《正蒙》的动机。同时他也指出:“由于时代的变迁,学术研究的发展,现在需要一部适宜于当代读者的新的注译,以供学习、研究之用,本注译评就是为适应这一新的时代要求而撰述的。”1990年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该书后,于是很快得到学界的关注与赞誉,纷纷给予了公正的积极的评价,其中以陕西师范大学著名学者赵吉惠先生的观点最为详尽中肯。

赵吉惠先生在《甘肃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上发表了一篇专文书评,题目是“导读《正蒙》的理想之作——评喻博文新著《正蒙注译》”。赵先生首先对这本书做了基本评价,他说:“喻先生积十余年之研究成果,历尽艰辛,多方搜求善本,摄取当世最新研究成果,做成《正蒙注译》,填补了一项历史文献研究的空白,为中国文化史、宋明理学、张载及其学术思想的研究开拓了新路,提供了资料方便。”赵吉惠先生总结了该书的三个突出优点或特点:

其一,“吸收前人诸家之长,融入作者研究成果”。赵先生首先批评了近年来古籍新注中的浮躁之风,虽时常有佳作,但望文生义而成笑柄、抄袭他人以讹传讹者也不乏其人。而喻博文先生则态度严肃,治学严谨,他广求善本异本,对前人的注疏反复钻研,对一些有歧义、疑义的难解之字句,都表述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赵先生举例说,在注

释《天道篇》“不得名，非得象者也。故语道至于不能象，则名言亡矣”时，征引了《周易·系辞传》：“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王弼《周易略例·明象》：“夫象言，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尽象，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系辞》与王弼的论述为张氏所本，同时也批评了王弼的“‘忘象’、‘忘言’说”。旁征博引，引用了历史文献的原始出处，条分缕析，精辟地解释了它的思想内涵，不但帮助读者理解原意，还便于他们扩大视野，独立思考。《正蒙》一书，用《正蒙初义》的作者清人王植的话说是“义蕴宏深复声句聱牙”，意思是该书内容艰深难解，语句又拗口难读，他甚至认为，“《正蒙》之传未若程朱之书之盛者”，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这当然是他的一家之言，另作别论。

再如《参两篇》是张载专门论述宇宙本源及其运行规律的内容，历代学者尤为难解。喻博文先生引用了郑文光、席泽宗所著《中国历史上的宇宙理论》一书中的观点，以地球自转注解“天左旋、右旋”，说明地球运动的内因。他还在注解“日月盈虚”、“地有升降”、“海水潮汐”、“日质本阴”、“月质本阳”等古代朴素的科学概念时，都以现代天文科学知识做了比较明确的解析。这样既符合原文本义，又能使读者在现代科学基础上对于原文达到较为深入的了解，这当然是以往旧的注本所远不企及的。

赵吉惠先生言简意赅地对《正蒙注译》一书评价为，它既是一本历史文献注释性著作，浸透着作者多年研究儒学以至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更是一部阐释宋代理学的经典之一《正蒙》哲学思想，富于理论价值的学术研究成果。



其二,赵吉惠先生认为,《正蒙注译》一书,是一本评注兼备,褒贬适当,导读性很强的著作,它是研究、普及、弘扬传统文化的基础性工作,这样的书籍特别受到青年读者的欢迎。赵先生把这本书与杨伯峻所著《论语译注》、《孟子译注》和陈鼓应所著《老子注译及评介》、《庄子今注今译》相提并论,认为它的突出优点是,注译文字简明易读,文尾的“主旨”概括性强,学理透彻,观点明确。表明作者治学态度严谨,方法得当,注译内容深入浅出,具有科学性和时代感,既吸取前人之长,又奏出时代之音,给予读者提供了研习的思路,又留有进一步探索的余地,发挥了良好的导读作用。

其三,赵吉惠先生认为,《正蒙注译》既是学术性著作,又简明易懂,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他指出,注释、翻译古书是非常困难而极有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工作,可以说具有永恒的生命价值。在《正蒙注译》中,对注释的字、词、概念、名物、制度、历史、人物、典籍等,都持之有故,言之有理,翻译文字准确、流畅。对少数不宜直译的段落,另外又加以说明,既忠实于原文,又可供读者独立思考。赵先生进而指出,本书最为精彩之处,就是训诂文字与疏理思想协调相通,注释资料翔实,每有新见,译文忠实于原文正义,明白流畅。每篇后的总结性评析切中肯綮,既扼要概括了该篇的基本内容,又言简意赅地表达了自己的见解,指出这种观点的借鉴意义。这样本书就超出了注译的界限,同时又有作者的简评,凸现了这本书的理论与现实的价值。这是因为喻博文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精于训诂,学养深厚,所以著就了这本《正蒙》今注今译今评的理想佳作,对于研究、弘扬及普及中国传统文化优秀遗产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大家都知道,当代国学大师、中国哲学史研究泰斗张岱年先生特别重视对张载思想的挖掘和研究,对于张载学说中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他的引导

下,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进一步重视了对张载思想的关注与研究。1990年,喻博文先生的《正蒙注译》出版不久,张岱年先生特地致信喻先生,信中说“大著功力宏深,实为宋代哲学研究的新贡献,谨表示赞佩之意”。张岱年先生称赞喻先生“功力宏深”,而前文已引王植曾言《正蒙》“义蕴宏深”,无独有偶,两个“宏深”应当都是确语,不是巧合。张岱年先生历来治学严谨,出言谨慎,可见这里绝不是溢美之词。新中国成立之初的50年代,张岱年先生就出版了关于张载思想研究的专著《张载——十一世纪中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并在他的另一部专著《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专门设一节介绍张载的哲学思想,因此他把喻博文先生引为同道知音,应当事出有因吧。在《正蒙注译》初稿写成后,喻先生曾经去北京拜访张先生,就《正蒙》中几处疑难问题请教,张先生作了详细解释,并热情支持这部著作早日修改定稿面世。

喻博文先生的《正蒙注译》出版,得到了哲学界的好评,1991年8月在全国张载哲学暨关学学术讨论会上将此书选为参考书之一,1993年荣获甘肃省社会科学最高奖二等奖,可谓是实至名归。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陕西眉县张子(即张载)祠堂的石碑上,并列镌刻了张载《西铭》的原文和喻博文先生的译文,由此可见,关中父老乡亲对喻先生成果的认同和褒奖。《正蒙注译》不仅在大陆境内颇有影响,而且得到了海峡对岸台湾学界的响应,该书出版十年之后,2001年台湾中兴大学学者胡楚生先生还来信索要本书,信中说道:“久钦盛誉,惜未识荆,承惠大著,衷心感激,自当仔细拜读,多受教益。”由此可见,海峡两岸学界对这本书都可谓关注备至多。

喻博文先生撰写《正蒙注译》的过程也就是他深入细致研究张载哲学思想的过程,在此深厚细密的基础上,喻先生参与了由葛荣晋教授主编的《中国实学思想史》上卷第四章《横渠学派及其实学思想》的撰写。这自然又是一篇水到渠成的著作。所谓实学,葛荣晋先生在该书导论中说,



就是从北宋开始的“实体达用之学”，在不同时期、学派、学者那里，其实学思想或偏重于“实体”，或偏重于“达用”，或二者兼而有之。张岱年先生在其《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的“修订本序言”中从另一个角度表达了他对“实学”的看法。他说，“中国过去是否有一个唯物主义传统呢？……我认为，历史上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两个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这就可以肯定确实有一个唯物主义传统了。中国过去没有唯物主义的名称，但这不是没有唯物主义传统的理由。……王廷相（明代哲学家，其哲学思想是从张载到王夫之的重要发展环节，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编者注）曾标举‘实学’二字，如说：‘《正蒙》，横渠之实学也’（《慎言》）。我们可以用‘实学’作为唯物主义的名称。”《中国实学思想史》以人民大学资深教授葛荣晋教授领衔，由国内一批中国哲学史专家共同撰写，它是海内外第一部系统论述中国实学的基本特点、演化过程、发展规律及其当代价值的高水平的学术专著，它填补了我国思想史研究的空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

喻博文先生在他所写的关于张载实学思想研究的那一章里，承接了《正蒙注译》的思路和成果，并进而全面深入系统论述了张载思想的实质及其意义，其中不乏发前人所未见的真知灼见。张载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构建了比较详细、系统、完整的气一元论的哲学体系，他的思想对宋元明清哲学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喻先生在文章中对张载的宇宙观、修持论、政治论以及天地动植之学作了详细论述、评析。文章首先认为张载是古代气一元论的突出代表，例如认为宇宙是客观的真实的存在，上至苍茫天穹，下及大地万物，一切皆气之为存有，一切现象皆气之现象。张载并论述了古代学者提出的有关存在的主要哲学范畴，如虚与实、有与无、体与用、一与多等皆为气的不同存在形式。“气”有阴阳两端，是为万物运动变化的根源。根据此论批判了佛学“一切皆空”、老子的“有生于无”等谬说。

重视道德是儒学一贯学术思想传统,张载自然不会例外,在他的著作中多有论述。此文中第三节是评述张载的人生观、道德论及修养途径和方法。张载认为人生的目的是“成身成性,最终成为圣人”。圣人不是天生的,“圣人可以学而至”,但必须经过长期艰苦的修养,张载称为“修持之道”。“毋四”(无意、必、固、我之凿)、虚心、得礼、诚明、尽性、穷神等范畴的分析论述,揭示了修持之道的理论体系。张载的修持之道是修养论,也是认识论,其中包括人性论和人格论,是其思想理论最具实践性的学说。虽然其中有些封建陈腐说教,但面对今天社会以“钱”为人生目的的一些人说不是没有意义的。

社会政治、经济问题也是张载论述的重点。文章对此进行了分析评论。文章认为张氏继承了“民性邦本,本固邦宁”(《尚书·王子之歌》)的思想,提出“爱民”、“足民”的主张,为此力主推行古代的“井田制”,达到土地的“均平”,以解决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严重尖锐的矛盾。“在当时以王安石和司马光等人为首的新旧两派斗争中,其政治主张显然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态度,或者是中间路线。”这一看法值得当今有关学术界人士参考。

文章专列“天地动植之学”一节,讨论张载的自然科学见解。张载关于对自然和人的生理现象的观察与思考,并作出论述,这在宋明理学的著作中是十分突出的,《正蒙·动物篇》论动植物的共性和差异、论人之生死、呼吸、做梦等,还有其他文章中讨论天地、恒星、日月五星的运南海转、海水的潮汐、风雨雷霆的形成等天象问题。所有这些讨论都建立在气一元论的基础之上,做出比较科学的解释。更值得一提的是张载不相信世俗的鬼神迷信,认为“鬼神,往来屈伸之义”(《神化篇》),鬼神即太虚之气的运动变化,并探讨了鬼神迷信产生的社会根源,认为这是“起于王法不正”,弱小者无力反抗强有力者的控制和压迫,“屈抑无所伸”,没有地方没有力量为自己说理申冤,或因为有疾



病无力求医,在无可奈何之中,只有求助冥冥之中的神灵(《经学理窟·周礼》),鬼神迷信思想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应当说这一观点在今天仍然是有价值的见解。

喻博文先生在这篇关于张载实学思想的专著中,似乎可以得说,既体现了“汉学”的方法,又阐发了“宋学”的精神,它从新的视角对张载及其学派的思想作出了总结性的探讨,论证分析深刻,其中阐发了不少自己的创见。

喻博文先生自述,“晚年喜《易》,除继续理学的习究外,并研究《易》学”。《易》又名《周易》,儒家典籍六经之一,汉代人通称为《易经》。现在所谓的《周易》,包括经、传两部分,传是对经的解说,一般认为,传是战国以来陆续形成的系统阐释《易》的作品的汇集。喻博文先生对易学的研究重在易学哲学思想及其发展历史。其实,喻先生对《易》学的专注,与他对儒学、宋代理学及张载思想的研究是交织在一起的,是相互发明的。前述喻先生的《正蒙注释》出版于1990年,是他之前十余年呕心沥血的成果,即20世纪七八十年代完成的。而这一时期喻先生对理学和易学的研究是穿插融合在一起的,他于80年代起在国内权威杂志陆续发表了一系列颇有分量的论文,在易学研究中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成果斐然。其中如《评横渠〈易〉理》(《中国哲学史研究》1984年第4期),《体用同源,显微无间——程颐的易学方法论初探》(载《洛学与传统文化》论文集,求实出版社1984年版),《王弼易学的方法论思想》(《中国哲学史研究》1987年第3期),《论〈周易〉的中道思想》(《孔子研究》1989年第4期)。其中最后这篇论文系统地阐明了《周易》经、传的中道思想,时有新见,如提出《象传》中“小象”释爻辞时常言“吉”、“元吉”、“大吉”的理由说“以中正也”;“大象”释卦名、卦义中“君子以……”的句式,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象》),“君子以弗礼弗履”(《大壮·象》),“君子以居贤德善俗”

(《渐·象》)等,所言即每卦中道思想的具体内容,而“中道”即中正之道,是儒家为政、处人、做事的最高道德标准。这一观点发前人所未见,确系独创之见解。喻先生又发表了《〈周易〉研究十年述要》(《烟台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对1980至1989年十年期间国内研究《周易》的进展情况作了准确总结。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华夏大地兴起了“易学”热,一方面对弘扬传统文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是学术界解放思想、解放思想的产物,另一方面,毋庸讳言也有一些鱼龙混杂的消极状况,应当不纳入易学研究范围。这种评介综述性的文章,并不好写,需要作者学识渊博,深谙易学之道,又眼界开阔慧眼独具,学理分析透彻,具有举重若轻的驾驭能力,才能鞭辟入里,做出简明扼要全面准确的结论。喻先生的这篇论文包含了上述的要素,内容丰富,资料翔实,颇具参考价值,对我国易学研究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易学为儒学之宗,儒家创始人孔子晚年尤其喜读《周易》,刻苦钻研,反复披阅,以至“韦编三绝”,由此可见易学在儒学中的核心地位。易学源远流长,历时两千余年,历史上形成了不少流派,许多著名的哲学家都依据《周易》经传提供的思想资料,建立起自己的哲学体系。宋代理学以儒家孔孟思想为根本,兼收佛道哲学的思想,进而建立的新的思想体系,与儒学的源流关系不言而喻,张载著《正蒙》及《横渠易说》,《易》之经传对他影响最大。喻博文先生出入理学、易学之间,其治学的路径自然是合乎逻辑的。喻先生在研究易学古奥之理时,又以教师的传道解惑本分,撰写了《易学琐言——易学知识百题问答》,连续发表在由山东省周易研究委员会编纂的《易学通讯》1993年第二、三、四期,全文约八万余字,融学术性、知识性、通俗性于一体,该文虽未公开出版,但确系一本名副其实的研究、普及易学精髓的力作。正如喻先生所言,深感有总结吸收前人的《易》学研究成果,博采广觅今人对《易》学探讨的学术精华,编撰一普及通俗的读物之必要,